



结伴同行 1982年，
Makos和沃霍尔在巴
黎划船。

“Andy and Christopher in Rowboat”, Boit de Bologne, 1982年巴黎，摄影 Christopher Makos

BACK TO THE GOOD DAYS

1982年，摄影师Christopher Makos曾跟随这位美国艺术家游访中国，34年后，他为了M WOODS木木美术馆举办的《安迪·沃霍尔：接触》展览，再次回到北京。

撰文：赵文睿

在北京，
34岁的Christopher Makos
和54岁的Andy Warhol

沃霍尔、工厂、1970 年代的
纽约、1980年代的北京——这些
人事、景致和时光都被
定格在了Makos 的黑白照片里。

生于马萨诸塞州的 Christopher Makos 定居纽约已有 40 余年，却依旧保留着骑自行车探索这座城市的习惯。他笑称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搭地铁，因此总在工作室门外停着一辆自行车。1970 年代到 80 年代，他也总是骑车从自己位于西村的寓所前往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名为“工厂”的工作室。

Makos 现在的工作室里，沃霍尔依旧无处不在。即使混杂在 Makos 大量新作与旧作中，这位艺术家在肖像中的苍白面孔和冷峻目光依旧十分显眼。甚至在 Makos 给朋友的宠物狗拍摄的照片里，小狗也顶着一头沃霍尔式的发型。他与沃霍尔在 1976 年相识，既是朋友，也是默契的搭档。虽然沃霍尔比 Makos 年长 20 岁，却被这位年轻摄影师的才华和充沛精力所吸引，因此将初出茅庐的 Makos 带入了纽约艺术圈。同时，Makos 也影响了沃霍尔的摄影创作，并成为了沃霍尔生命最后 10 年中最活跃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

在工厂里，Makos 和沃霍尔展开了对彼此艺术生涯都极具启发性的摄影合作，他将这段合作形容成了一场“仿佛可以永远进行下去的约会”。



艺术合作 顺时针从上至下：1983 年，Makos 在《Interview》杂志上的摄影专栏；1981 年，戴着假发佯装成女性形象的沃霍尔；沃霍尔用宝丽来拍摄的自拍照。



虽然在 1960 年代，沃霍尔已经使用宝丽来相机拍摄过一些影像，但摄影在这位艺术家当时的创作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Makos 的出现让沃霍尔意识到了摄影作为艺术手法的可能性。1976 年，即沃霍尔与 Makos 相识的那一年，这位艺术家正在苏黎世旅行，瑞士艺术经销商 Thomas Ammann 向他展示了那时最新潮的美乐时（Minox）35EL 相机，那是当时最小巧便利的 35 毫米胶片相机。沃霍尔瞬间就被迷住了：“这太棒了，简直像 007 特工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用的相机。”然而美乐时 35EL 那时在苏黎世已完全售罄。离开苏黎世抵达德国波恩后，沃霍尔立即前往摄影器材店购买了这部相机，这是他的第一台 35 毫米胶片相机。Makos 则教会了沃霍尔如何使用它。

沃霍尔一直都有随身携带录音机录下与他人谈话的习惯，但在拥有了那台相机后，他便将录音机搁置一旁，转而带着相机出现在工作室和其他各种场合，每周能用掉好几卷胶卷。最后他萌生了将这些照片出版成册的想法。Makos 担任了这本摄影集的艺术总监，时任《Interview》杂志编辑 Bob Colacello 则为每一幅照片撰写了短小幽默的文字。1979 年，这本名为《Exposure》（曝光）的摄影集出版，当中生动记录了纽约上流艺术文化圈的社交图景，包括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等名流。

Makos 现在的工作室里有一个玻璃匣子，里面陈列着一顶银灰色的女士假发。1981 年的工厂里，画着精致妆容的沃霍尔戴着这顶假发，身着中性服饰，站在了 Makos 的镜头前。那两天内，Makos 拍摄了 300 余幅沃霍尔的异装照片，由此诞生了《Altered Image》（变更的形象）这组作品（又名《沃霍尔女士》）。创作的灵感来自艺术家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摄影师曼·雷（Man Ray）于 1921 年的合作：杜尚头戴女帽，身着女式大衣或皮草，化名 Rrose Sélavy，由曼·雷为其拍

上起顺时针：Mechanical paste-up for Makos' "IN" column,《Interview》杂志，1983 年，版权属于 Makos Archive；“Self-Portrait in Drag”，安迪·沃霍尔，1981 年，Polaroid™ Polacolor 2，10.8 x 8.6 厘米，版权属于匹兹堡安迪·沃霍尔博物馆；Founding Collection，Contribution The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Inc. 1998.1291；“Self-Portrait”，1977 年，Polaroid™ Polacolor Type 108，10.8 x 8.6 厘米，版权属于匹兹堡安迪·沃霍尔博物馆；Founding Collection，Contribution The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Inc. 1998.12881



时代气息 Makos 作为沃霍尔的好友，时常会在一起交流各种作品创作的可能性，或在摄影技术层面为其提供建议。这次北京之行中，与他的对话仿佛让我们回到“工厂”。

摄影：曾剑



契机 木木美术馆创始人之一雷宛萤（左）说：“记得约 4 年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一次看到沃霍尔的作品‘Screen Test’。当时的感觉很难用语言形容，我好像被这些充满魅力的人包围，无论我看向哪个方向，在我注视着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专注并真诚地注视着我。我甚至有点不敢看他们的眼睛。那是一种美妙的体验，像一场穿越时空的碰撞。那时我就在想，如果中国的观众也能有这种体验该多好。”

摄影：曾剑

北京之旅 1982 年，沃霍尔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摆出太极的姿势。



1970年代，所有人都和我认识安迪·沃霍尔是一件多么酷的事情。但我从未是安迪的粉丝，我始终是他的朋友。

摄了一组肖像。沃霍尔私人的艺术收藏中也有曼·雷的作品。“沃霍尔可以成为一个俊美的女人。”Makos 注视着墙上的这组作品说道。沃霍尔一直对形象这一概念痴迷。他热衷于为名流创作肖像，也乐意让自己的身影定格在别人的镜头里。“我们对他人的印象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Makos 追问道，“如果给一个男人的脸抹上妆容、戴上假发，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印象？沃霍尔的‘形象’又经受了怎样的创造和改变？”1980 年代的纽约地下艺术圈，同性、变性、异装并不罕见，沃霍尔的社交圈中也不乏各种知名的变装皇后，但 Makos 却再三强调，这组作品并不是为呈现沃霍尔异装或变性这些肤浅噱头，而是对形象和身份的探讨。确实，在当时的纽约，有谁比沃霍尔更多变也更复杂呢？1970 年代初，Makos 在巴黎学艺期间也曾师承曼·雷。“曼·雷告诉我说要追随自己的直觉。”Makos 回忆道，“他和沃霍尔对我都说了同样的话：做你自己的艺术，不要想太多。让别人去决定

你的作品是好是坏，他们喜欢或是不喜欢。有在乎他人评价的闲工夫，不如趁此时间创作出更多作品。”

“我所在的工厂和1960年代的工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Makos回忆道。1960 年代的工厂就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永不停止的夜夜笙歌，绘画、电影、音乐在这里共同发生，还混杂着各种衣香鬓影的浮华。但在1968 年，沃霍尔因弄丢了剧作家 Valerie Solanas 的剧本而被恼羞成怒的 Solanas 开枪击中险些丧命后，工厂的活动就收敛了许多。到了1970 年代，沃霍尔为丝网版画和电影的创作另寻他址，工厂内开展的艺术创作也逐渐减少，这间曾人来人往的工作室便从艺术和派对工厂变成了生意工厂。

沃霍尔的生意有4条主线：绘画、电影、肖像创作，以及《Interview》杂志。他有着一支庞大高效的沃霍尔大军：协理打理艺术项目有逾10 人，杂志团队约15 人，肖像、电影方面另有专人，还雇有管理工作室的经理、公关、不断更换的实习生等等。Makos 每个月都会为《Interview》这本关于风尚和名流八卦的月刊摄影专栏提供照片，拍摄时下最新潮的单品或是名人派对。沃霍尔还极具识别新秀的眼光，他发现了演员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和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等人，并让 Makos 为这些新人拍摄的照片登上杂志。

如果说1960 年代形形色色的名流来到沃霍尔的工厂是为了兼行艺术创作和寻欢作乐，那么1970 到80 年代出入工厂的人群则大多抱着商业目的而来。Makos 坦言他并没有和工厂里其他任何人有过艺术方面的合作。

“Andy Doing Tai Chi in His Beijing Hotel Room”, 1982 年，摄影 Christopher Makos



记忆碎片 从上至下：
1982 年 10 月，Makos
和沃霍尔在北京
天安门前拍下的留念照；
中国之旅的行程单。

沃霍尔时不时会在工厂内举办商业午餐。这些午餐的目的虽以商业为主，但氛围仍十分随意，餐食大多是普通餐厅外带，附近一家打着健康饮食名号的餐厅 Brownies 就深得沃霍尔和工厂职员们的青睐。沃霍尔庞大的商业帝国就随着这些各色人等在工厂的进进出出，井然有序地运转和扩张。1987 年这位艺术家去世时，他的身价已达 2.28 亿美金。

可以说，沃霍尔定义了 1960 至 80 年代的纽约文化、艺术和不断商业化的艺术市场，但是如今的纽约似乎正逐渐抹去沃霍尔曾留下的痕迹。《Interview》杂志在 1987 年沃霍尔过世后易主；Brownies 餐厅旧址入驻了新的店家；沃霍尔遭受枪击的联合广场西 33 号被改造成了一幢公寓楼，底层是一家糖果店；而 Makos 编辑《Exposure》和拍摄《Altered Image》的百老汇大街 860 号，如今则变成了一家宠物用品商店。“70 年代在大多数纽约客们的脑海里已经消失了。”Makos 说，“我还记得 1977 年的那场大断电。但对很多人来说，对那个年代的记忆就像断电之后降临的一片漆黑，什么都不可见了。”

1982 年，在北京看到的那些中山装
设计简洁、线条鲜明，让我们
感觉简直像皮尔·卡丹 (Pierre Cardin)
的高级定制。

在工厂合作之外，Makos 和沃霍尔也时常结伴旅行。在拍摄一路所见所闻的同时，这位摄影师也一路拍摄沃霍尔。在他的摄影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沃霍尔的身影出现在阿斯彭、巴黎、柏林。1982 年，他们受到香港商人萧永丰 (Alfred Siu) 的邀请，首次来到了中国：先是抵达香港，再前往北京逗留 4 日，最后经由香港返回纽约。

当时年轻的萧永丰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不久，回到香港后便计划筹建一间名为 I Club 的私人会所。在美求学期间就对美国艺术界有所了解的萧永丰，希望可以用时下最炙手可热的美国艺术家作品来装饰会所，也可以借此契机将美国的当代艺术引入香港。除了沃霍尔之外，他还为此收藏了 John Chamberlain、Roy Lichtenstein、Robert Rauschenberg 和 Jasper Johns 的作品。I Club 并非萧永丰的第一个艺术计划。在此之前他还举办过一个国际建筑设计大赛，为其在太平山顶的一块地设计休闲会所，邀请了如矶崎新等明星建筑师为评委。那一次比赛最终获奖的方案来自当时还名不经传的扎哈·哈迪德 (Zaha Hadid)。虽然这个建筑项目后来无法落实，却让扎哈·哈迪德在建筑界一炮而红，也让萧永丰收获了远见卓识的美名。

1982 年 10 月 31 日清早，在前一晚 I Club 开幕式的狂欢中醒来后，沃霍尔、Makos 及一行友人便在萧永丰的陪同下乘坐国航班机飞赴北京。沃霍尔为了此行还特地剪了短发，生怕自己的一头长发在内地会给他造成麻烦。

1980 年代初的中国满足了沃霍尔对复制的痴迷。以丝网版画闻名的他在千人一面的蓝色和绿色制服里看到了重复和一致性的美学。“那些中山装颜色低调、设计简洁、线条鲜明，让我们感觉简直像皮尔·卡丹 (Pierre Cardin) 的高级定制。”Makos 回忆道。沃霍尔也经不住这“时装”的诱惑，穿上了一件笔挺的中山装、头戴一顶绣有红星的军帽，站在了 Makos 的镜头前。



从左至右：“Hand-timed tourist souvenir photo of Warhol and Makos in Tiananmen Square”, 1982 年；
“Typed itinerary for Warhol 3-day trip to Beijing from Hong Kong”, 1982 年。版权属于 Makos Archive (2)



创新时期 这次展览的主要线索是沃霍尔的工厂时期的作品，那是他宣布停止绘画后，大量运用当时最前沿科技创作的一个时期。

摄影：曾剑

他的肤色和头发在深色中山装的映衬下显得更为苍白。和着女装、戴假发的“沃霍尔女士”一样，这幅沃霍尔的中山装照片也讨论了由形象的变更造成的对自我身份和他人认知的影响。正如再浓艳的妆容都无法遮盖沃霍尔棱角分明脸庞中透露出的那种刚硬，一身制服也无法就此遮盖他来自的国度，以及他浸染其中的制度和文化。这份似是而非的张力正是 Makos 眼中的沃霍尔所代表的文化和风貌。

1972 年，沃霍尔依照《毛主席语录》上的一张照片，以丝网印刷的方式创作了毛主席肖像。浓重的色块为原本肃穆的领导人画像添上了商业广告般的浮夸，而沃霍尔的笔触也为原本千篇一律的画像注入了个人的气息。沃霍尔对政治一直以来都极有兴趣，而 1972 年的尼克松访华则促使了他对《Mao》的创作。而 10 年后，在天安门城楼前，Makos 将镜头对准沃霍尔，按下了快门。他穿着夹克衫，背着双肩包，拎着照相机，站得笔直，脸上没有笑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表情。若不是这个肤色白皙、头发蓬乱

的外国人面容，与周遭好奇地注视着他的行人的脸庞如此格格不入，这张照片与典型的中国游客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到此一游照似乎没有分别。

旅行途中，Makos 一直都在拍摄沃霍尔，沃霍尔则拿着他的相机在拍北京。这位艺术家因展现消费文化的《Campbell's Soup Cans》和《Coca-Cola》系列作品成名，在漫步京城时他也对广告牌报以格外的关注。巨大广告牌上“1981 年荣获国家金质奖”的蓝天高级牙膏，由铝锰合金制成并获得“轻工业部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证书”的厚底水壶，还有北京第一针织厂的针织衫都被定格在沃霍尔的照片里。沃霍尔对北京的影像记录显示了他的好奇和随性，从石狮子模样的果皮箱、紫禁城里张贴的景点的中文介绍、街上的民众，到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的建筑细节，这些照片并不讲究严谨构图或精确对焦。沃霍尔对相机的使用方式似乎更贴近于我们如今用 iPhone 和 Instagram 的方式。他将它们作为视觉日志，既记录着他的生活，也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个人回忆 雷莉莹在展览现场提到自己在上美院期间，有一位好友受沃霍尔的影响颇深。“她的公寓有些像一个迷你型的沃霍尔工厂。记得那时只要学校一没课，我便往她家跑，我们经常在一起拍照，看电影，画画，读书，和做地下音乐的朋友一起唱歌听音乐。那里有某种能量，好像每天都会发生些什么，每秒都不知道会走进来什么有意思的人。”

摄影：曾剑 发型：陈锋 (THE FUR Studio)
化妆：Marian Woo 造型助理：Tao Li

沃霍尔将初出茅庐的 Makos 带入纽约艺术圈，Makos 也影响了沃霍尔的摄影创作，并成为了这位艺术家生命最后10年中最活跃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

在来中国之前，Makos 还去过前苏联和东德。然而在中国，他却感受不到他在东柏林和莫斯科时所体会到的逼仄和高压感。在北京，浸染他的是京城人民悠悠地过日子的闲适，以及淳朴。长城的长和故宫的大固然震撼，但 Makos 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在农贸市场的经历：人们在番茄里简单加点糖，或是黄瓜里加点盐和醋，遂成一盘美食，令他不免感叹这个城市的质朴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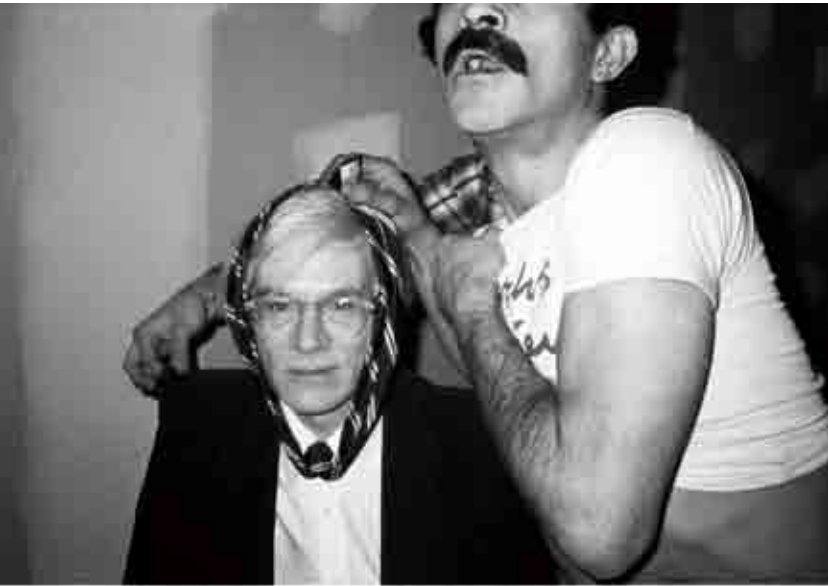
Makos 第二次的中国之旅与第一次相隔 25 年之久。2007 年重返北京时，他深感城市风貌的巨变，央视大楼等诸多由国际明星建筑师所设计的大楼更让他印象深刻。那一次北京之行，距离沃霍尔逝世已有 20 年，Makos 再次在北京漫步的镜头里也不再会有沃霍尔。但沃霍尔并没有那么容易摆脱。人们还总是会提到他的作品时提到这位艺术家，也津津乐道他和沃霍尔的往事。Makos 说：“1970 年代，所有人都和我认识安迪·沃

霍尔是一件多么酷的事情。但我从未是安

迪的粉丝，我始终是他的朋友。”他眼中和镜头下的

沃霍尔并没有外人为之套上的光环。虽然他依旧在不断整理和出版当年和沃霍尔合作的照片，但他也

重返北京 从上至下：
穿着中山装的沃霍尔为了来中国旅行特意剪短了头发；1978 年，沃霍尔在工厂里。



表示自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一味沉浸在过去是自己给自己判的死刑。”

Makos 正在创作的摄影系列名为《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这个标题来自于美国宪法，“我们人民”是宪法开篇的首个词，确立了“我们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在这个系列中，Makos 将自己在 中国所见和他在美国旅行时拍摄的图景并置在一起，以实际经验再次思考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似与差异。Makos 还以当下的中国人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肖像作品。他拍摄的既包括崔健、潘石屹等各界响当当的名字，也有不知名的按摩师、杂技演员等等。这些拍摄肖像的过程被他形容成一种心理咨询。“这是一个格外亲密的时刻。我总试图去了解我的对象，观察他们的反应。”而对这些拍摄对象的了解也成了他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国的途径。

8 月，他会为 M WOODS 木木美术馆举行的《安迪·沃霍尔：接触》展览再次来到北京，作为这位艺术家创作和生命最后 10 年的记录者，重述他和沃霍尔的往事。“我不敢想象自己已经 68 岁了！”虽然依旧洋溢着热情和活力，他还是感慨道：“我不断在改变，但那个充满好奇心的我从未改变。”Makos 工作室墙上的沃霍尔依旧会注视着他，一个个沉重档案匣子里底片上的纽约故事在他的记忆里依旧清晰。但那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也并不愿意过分夸大这段经历。沃霍尔、工厂、1970 年代的纽约、1980 年代的北京——这些人事、景致和时光都被定格在了 Makos 的黑白照片里。Makos 开玩笑说道：“我选择摄影是因为我没有记忆。”但事实却是，他比谁都记得清楚。照片就是他的记忆，而这个仍有孩童般发现欲的摄影师正不断为自己、为我们创造出新的记忆。■